

## 古老的中国玉文化

玉是远古人们在利用选择石料制造工具的长达数万年的过程中，经筛选确认的具有社会性及珍宝性的一种特殊矿石。远古人们用玉材制造工具或武器是有条件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近年发现的以玉工具为代表的文化区域极少，而大多数原始文化群体均用玉制造非生产用器物，它的社会性、珍宝性大大超过其实用性，玉材主要被用于社会的非生产性的各种文化活动。

我国甲骨文中已有“玉”字；先秦古文献中记载孔子论“贵玉贱珉”时已指出玉有十一德；西汉刘安假托风胡子之口提出“玉兵”时代并指出“玉为神物也”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释“玉”字时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首次对玉作了明确的解释，成为后世人们释玉的圭臬。18世纪中期，西方矿物学者昆兹化验了和田玉器，将其定名为角闪石族的透闪石或阳起石，简称角闪石玉或透闪石玉或阳起石玉。1862年法国矿物学者德穆尔化验了清宫翡翠，定名为辉石玉。他根据和田玉硬度为6—6.5，翡翠硬度为7，把它们分别称为软玉、硬玉。我国玉材往往以产地定名，在众多玉材中仅以和田玉为真玉，其它各地所产的

诸种玉为非真玉。翡翠是我国玉材中的新品种，可能始见于汉，再现于宋内廷，清中叶大量输入，逐渐为皇家与市庶所接受，其市场价格现已大大超过和田玉，所以我们说翡翠是我国玉材中的后起之秀。

远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从大量石头里筛选出玉之后，除了用于制造生产工具之外，更多地用于美身、祭祀、瑞符、殓葬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特殊形制的玉器，可代表大自然的神灵；表明人的地位尊卑；或殉葬。由于玉的社会用途极为广泛，就促进了玉器造型、及琢磨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古人最初是用制石工艺制造玉器，进而发明了旋转性砣机和金刚砂以琢磨玉器，促使石、玉工艺分离，出现了独立的玉器工艺。先进的工具制造的各种玉器，无比丰富地深入了社会文化生活。

玉、玉器用于非生产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标志着社会的等级秩序；它在巫术信仰、审美观念、伦理道德的成长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它历经了大约万年持续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里都曾出现过异乎以往的新面貌，也呈现出不同的进化状态。如史前阶段，它在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领域里都起着主导作用，而其它物质材料（如石、木、牙、角、骨等）所制器具都是它的补充。进入文明时代，玉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奉为“神物”的至高地位虽然已经动摇并逐渐被取代，但其文明奠基石的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放射出夺目的光彩。玉器在帝王的统治（“瑞”，，）祭祀（“器”，，）活动中仍占首位，居于金、银、犀、角之上，在其豪侈的日常生活里因受材料来源制约，数量偶有减少，但总的趋势是与日俱增的。而市庶作玉随着士族门阀统治的衰微，便乘势兴旺起来。在同一发展阶段里，各地区的发展状况也是不平衡的，不仅有先后之别，还有高低之差。

治玉中心与政治中心也由一致走向分离。史前时期受到生产

与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玉材蕴藏量的制约，治玉中心似在东部地区，然南北两地的治玉水平已出现高低之分，它体现了各地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时代、地区的不平衡性贯穿于玉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上述这一切也就是玉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态，也是玉、玉器演进历史的必然结晶和升华。

玉文化的科研工作可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横的方面包括：玉材、工艺、功能、名称、形饰、艺术、仿古、作伪、鉴赏、辨伪以及收藏十一点，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并在纵的时代系列中前进演变放射异彩。玉文化是一严肃的科学概念，在此就玉文化的发展脉络进行初步梳理，按年代先后，针对其纵横的交错影响及其基本演变作一扼要的评述。

### 一、华夏文明的第一奠基石—远古玉文化 (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至距今四千年)

玉文化从诞生到形成大约经历了六千年，各地原始部落由独立发展走上逐步联合，创造了既是多元的又是趋向统一的远古玉文化。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玉器是距今 8200 年的兴隆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一对白玉块，其工艺虽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原始性，但已达到比较精工的水平。可视此玉块并非最原始的玉器，故将玉器的源头定于距今一万年，远古玉器的盛期及高点应在距今 6000 年—5000 年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时代。

红山文化之前的诸原始文化部落玉器大多为玦（见彩图）、璜、管等美身玉器。玉雕刻器、玉斧等生产工具有沈阳新乐文化，广鹿岛吴村文化以及汉中龙岗寺仰韶文化等部落相当突出，可为“玉兵时代”作有力注脚。红山文化部落的玉文化已经形成，如祭祀偶像（神物）—玉龙（见彩图），代表等级地位（瑞）的勾云纹器、兽首玦、环角圆孔器、玉马蹄形器以及殓尸用的玉璜等玉器。玉材可能是就地采取，即医无闾玉，或为珣玕珣。琢玉的工具为原始砣机，已完全具备玉文化的条件，同时又是北系玉器的代表。

稍迟的东南良渚文化玉器，不论在社会功能、器型、工艺，还是在组合关系及其数量方面来说，均标志其玉文化业已完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深刻地反映该部落的政治统治、巫神信仰、祭祀形式、人际尊卑、玉殓葬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内涵。几乎可以这样说，该部落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用玉来完成，甚至有关纺织的祭祀活动也要用玉捻锤来提高其品位和层次。玉在社会生活中的头等位置是不言而喻的。具有代表性的玉器器型有：象征王权的钺，它由玉片嵌柄以及禽兽饰玉钺；巫觋祀神的琮（见彩图）；象征苍穹和货宝的璧；神像头上的冠状饰；美身用的手镯；以璜为主件的颈胸串饰与带钩等。雕琢于琮、璧、冠状饰上的超现实的自然神及祖先神合一的神骑兽（实际上是龙）图案，已比原始性图腾更为进化，表明该部落社会发展层位是极高的。玉器数量很多，需要大量玉材，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裸露在地表上的玉矿。此玉矿可能在太湖北岸，玉资源非常丰富。这一切都促进了玉工艺的高度发达，其切割、琢磨、抛光以及雕刻等技术都处于各部落玉工艺中的领先地位，成为南系玉器的艺术典范。

与良渚文化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遗址出土的玉人像、玉刻图形长方片及玉龟背腹双甲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玉文化的铁证，概含着相当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河图、洛书及八卦等哲理观，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尚待发掘。

距今 5000 年前后，北南两系玉器在射阳河以北、鄱阳湖以南以及嶺南曲江一带发生接触与碰撞，由共处（大汶口文化及良渚文化的玉串饰并存）至融合，出现了一种合二为一的以土著文化为载体的新型文化，这就是分布于山东、中原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类型诸地方的后期原始文化，如山东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陕北石峁、延安两遗址以及甘肃天水齐家文化，在上述原始文化中玉器均占有重要地位，或有少量的琮、璧或兽面玦，反映了北南两系玉文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各地方玉文化的面貌十分清晰，如山东龙山文化的圭、璋、璇玑及冠形饰；石家

河文化的獠牙面、人面、兽面、凤、鹰饰坠等。前者以几何形玉器为主流，而后者则以肖生玉为其骨干，其地方特色极其鲜明，但又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北南两系玉文化的微弱影子。

从上述罗列的典型器物分析，足以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及文化活动的构架中不仅均离不开玉器，而且玉器占有其重要位置，所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此长达六千年的玉文化经历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并逐步广泛化、深入化，终于成为文化主体，成为巫神媒介及华夏文明基础的第一块奠基石。

## 二、统一格调的夏、商、西周玉文化

（夏、商、西周，公元前 2200 年—公元前 771 年）

我国青铜时代的夏、商、西周三朝是原始公社解体后相继出现的三个奴隶制国家，它以青铜铸造工具、武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三代铸造了大量的鼎彝，以代表王权和表示等级差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玉器不能像在原始社会那样，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继续占据主流或垄断地位，但是它在美身、祭祀、礼仪、殓葬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青铜文化无法取代的。

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艺术品以及杂品等七类，反映其用途甚广、地位至尊的历史面貌。其中肖生玉器占有很大份量，如：腰佩宽柄器坐人、梳短发人、蟠龙、立象、坐熊、立马、回首狗、兔、鹤、雁、鸂鶒、鱼等。还出现了簋（见彩图）、龙纹大刀等新型玉器。发人深省的是妇好墓还出土了红山文化的玉勾形器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凤，这说明收藏古玉已是古人的一种文化生活。

西周时期，玉文化沿着殷商轨道发展，在佩饰上出现新变化，如：串饰形式多样，长度加大，贵族玉佩多以璜为主件，杂以珠管，还有的以珠管为主，也有的用多种形式的玉片配以管珠而制

成，这些佩饰可能都是《周礼》、《诗经》所说的“杂佩”中的一种。

先秦古籍中并不乏有关玉器的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冬官·考工记》所载“玉人之事”表明了玉器的名称、尺寸，并指出它们在朝廷的政治，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价值。

夏、商、周三代玉器的时代风格及艺术手法继承原始社会玉器的成果，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采取夸大局部、不求形似、突出神韵的象征主义手法。而富于装饰性，观赏性的俏色玉璲的出现，说明崇尚自然、追求真实的写实手法仍在成长。此时治玉工具也由石砣机进化为青铜砣机。在线处理上大大跃进了一步，富有流畅婉转的韵律感，这一点是石砣机难以达到的。夏、商、周三代玉器的时代风格渐趋统一，这在殷商玉器中已经充分体现。此时玉器地不分南北，都有着统一的时代风格，象原始社会那样南北分为两系的现象业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殷商象征主义玉器艺术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手法集各时、各地玉艺之大成，且一统天下。当然，由于各个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统治辐射强度的差异以及文化根基的不同而造成的地方特色还是存在的，有的还表现得比较强烈，所以三代玉文化既有统一性，又有变化性，是此期玉文化的重要特色。

在此，特别要说明西周玉文化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即所见西周玉器中玉璜甚多，而璜是佩玉的主要构件，从此一侧面可以了解西周玉佩之盛，这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为什么西周盛行玉佩？这与“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准则和社会习俗有密切关系。君子有德，玉亦有德，两者既可媲美，佩玉于身是最好照应，这便促进了玉佩的发展，出现了“杂佩”。君子佩玉于身，形影不离，玉德

归于君子一身，岂不美哉！玉佩件由少增多，整套玉佩由短变长，长者过膝。君子佩玉约束行止，走路要迈方步，珩璜相撞，鸣之从容，和之以步，提醒君子要按古礼行事。对玉佩碾琢的要求随之提高，玉人全神贯注于雕琢玉璜，其工艺艺术质量日趋提高，这就是西周玉璜何以如此精美的内在原因。西周君子比德于玉，强调一个“温”字，《诗》云：“言念君子，温如其玉。”是说君子象玉那样温文而纯洁。玉文化的沉淀已大大超越玉的自然属性，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人们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将其从神权、王权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至今，在中国人心目中，和田玉是“温润”的，其实，这是从西周君子甚至是更古远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玉观念及审美观的沉淀，所以玉文化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它的效应也是持久的。

### 三、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东周玉文化之玉德的具体化、条理化 (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

公元前 770 年，由于周朝统治衰微，社会动荡，加以西北獫狁侵扰，平王放弃丰镐迁都至东部的洛邑，此后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代，其有名无实的统治持续了 450 余年（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由于地方经济大发展，地方实力强大，各地统治者（诸侯）纷纷而起，争夺最高统治权。此时“礼崩乐坏”、战乱不止，经过长期征战挞伐，出现了春秋五霸（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6 年）和战国七雄（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221 年）两个时期。在这一礼治衰亡的年代里，各诸侯都大力制造青铜器、玉器，为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僭越活动作礼仪上的准备。现在存世的此期玉器数量颇丰，除去东周王室玉器之外，还有春秋的虢、郑、晋、齐、秦、楚、吴、莒、邲、曾、黄及战国的韩、魏、赵、中山、燕、鲁、楚、越、曾、秦等诸侯国玉器，或细密婉约，或粗犷豪放。物主生前所用及佩带玉器大多精致无比，令后人无法企及，当然，这与使用铜铁砣具及玉人操作更为熟练有关。由于统

治者对玉器标准的要求甚高，故推动玉人琢磨玉器的技艺更加精进。

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问题，各派学者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儒家向来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政治上无法实现抱负的孔丘，便将人生目标转向教育，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传给后代，在儒学理论上颇有建树。孔子将由来已久的“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进一步发挥，具体阐明玉有十一德，以规范“君子”的行止作为，也就是说君子佩玉不是为了乔装打扮自己，而是要按照玉德那样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儒家的“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伦理道德信条，“克己复礼”，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玉德虽未挽救周王室走向灭亡的命运，但十一德作为伦理原则及行为规范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心底。成为潜在意识，驱动人们佩玉于身，代复一代地传继下去。这种玉文化的积淀影响了两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它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东周是战事频仍的时代，兵器、战术都有了很大进步，最重要的是由车战逐步转向马战。历史上的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就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战况作出的正确决策。中国南北是否都改为胡服骑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装和战术都在不断地改进，这影响到玉器也要跟着变化。从出土玉器来看，长大过膝的玉佩不再见了，所见者均为小型化、便捷化、利于骑射的玉佩，但其组合上都更富于变化。组件精美异常。玉璜多破边出扉棱，常见玲珑剔透者。玉带钩也应运而盛。玉龙佩、玉舞人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佩饰上有了变化。山东鲁国故城乙组 58 号墓出土玉佩，其上端为璧形，中间为作四层排列的柱形、管形和十字形的玉件。最下为玉龙。洛阳中州路 1316、2717 号墓出土的玉佩均以玉龙为最下的坠饰，这可能是东周王室玉佩的组合，其变体是显而易见的。玉龙还出土于晋、楚、曾、中山等国墓葬，温县西张计春秋盟誓遗址三七坎也有出土。河南洛阳金村周王室墓出土的玉舞人佩是以双舞人为主饰、玉龙为副件的玉佩。玉虎及冲牙也是此时

盛行的新型佩饰。玉具剑出土于春秋晚期墓葬。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曾出土玉剑璲、剑珌；玉剑首、剑格首见于江苏六合程桥二号墓，这是西汉玉具剑四饰的先河。

东周玉殓葬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地表现在玉“瞑目”的普遍化。继三门峡西周虢国 2001 墓瞑目( 14 件 )后 战国时期玉瞑目于洛阳中州路 1316 号 ( 27 件 )，1723 号 ( 23 件 )，2209 号 ( 13 件 )，烧沟 651 号 ( 13 件 ) 等墓葬中均有所出土，但似乎只东周王室成员有资格享用，是西汉玉衣的萌芽。各地出土的玉多用青玉或碧玉制成，其作工粗简者见于春秋晚期晋卿赵代墓、战国鲁国故城乙组 M52、中山国 M1、信阳长台关 M1、湖北江陵望山 M2、湖南澧阳新洲 M1、河南淮阳平粮台 M16 等墓葬，这些玉龙佩都是为了用于殓葬而仓促赶制的。同样出土于墓葬中的青白玉、青玉的精工细作的玉龙，均为死后殉于墓内的生前佩用者，两者必须加以区别，不应等视之。

#### 四、生前用玉与敛葬玉并茂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玉文化

( 秦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 221 年—589 年 )

秦是我国集权封建制的统一国家，秦王政先后灭关东六国，于公元前 221 年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至公元前 207 年子婴降于汉，国祚仅 14 年。从零星出土的玉器来看，在战国精细作工基础上玉工艺继续前进，现实主义因素突出了，但尚未见成熟之杰作。

刘邦建汉之后，遵循“无为而治”的思想治理国家，休养生息，至文景时期（公元前 179 年—公元前 141 年）天下太平，国富民强。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玉文化上仍然遵从儒家。至东汉，许慎释玉时指出：“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武帝开疆扩土，保护丝绸之路，加强了与西域的经济文化的联系。东汉虽维持西汉的传统政策，但国力未能彻底恢复，土地高度集中，豪强掠夺，民不聊生，饥民便揭竿而起，发生了黄巾起义，汉代统治终被摧毁。

四百年的两汉时期，人民使用铁器制造了各种工具、武器，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丰厚、坚实的物质基础，亦为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与科技的继续进步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此期的玉文化同样也是蒸蒸日上的，表现在朝廷、贵族、官宦、富商等阶层日常用玉品种齐全、数量庞大、工艺精湛、艺术高超。高足杯、角形杯、卮、羽觞、盒、飞熊水滴等器具华贵典雅、高尚脱俗。鹰、熊、马、猴、辟邪、坐人、仙人奔马等艺术品无不栩栩如生、活龙活现，标志着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胜利。玉具剑由首、格、玨、珌四件组合而成。出土于南越王、中山靖王墓葬的玉具剑饰完整无缺，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它的原貌，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其刻画精确利落、刚劲娴熟的高妙技巧。其螭虎翻腾奔跃，穿梭于祥云之中，有着气吞山河的豪迈形象。其造型、神韵的原模均来自现实的虎、豹，而在其形象中又充满着神秘气氛，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出玉雕。玉佩也是此期玉文化的代表性玉器，如镂空的玉龙纹环、玉龙螭纹环、璽形佩（亦称鸡心形佩）都是汉代玉佩的新组件。镂空双龙饰卧蚕纹璧、镂空双螭饰谷纹璧、宜子孙铭谷纹璧以及镂空神话座屏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型玉器。作工精巧异常，可能都是墓主人生前保存的重器。

汉代提倡孝道与厚葬，推动其殓葬用玉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以中山靖王刘胜为例，其敛葬玉的组合如下：包括金缕玉衣、鍤金铜镶玉枕、玉握（2件）、九窍塞（9件）、玉璧（24件）、玉环（1件）、玉圭（3件），共7种，<sup>41</sup>件。专门赶制的殓葬玉加工粗糙，在艺术上多不可取。唯有多出于东汉墓的玉蝉、玉豚，琢磨简洁，雕饰刚健，类似绘画上的“减笔”，古玩界称为“汉八刀”，有其独特的简犷的意趣。

汉代铭刻玉器出现了两个新品种，即玉玺（如西汉“皇后之玺”）和玉刚卯。前者是王权的体现，后者为谶纬之说的见证。

三国至南北朝（220—589年）玉文化处于战乱或南北分裂的条件下，其发展受到了抑制。从零星出土的此期玉器可知，其玉

器风格基本上是承袭汉代而略为简化，也可以说是简化了的汉代玉器，在玉器的社会功能上可能略有减弱。朝廷玉佩由于汉末丧乱，业已失传。“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从出土玉佩来看，确实不同于两汉之佩，计有云头形片、蝙蝠展翅状、花苞状片、近梯形片、璜。

## 五、隋唐五代宋辽金玉文化的新倾

### 向——外来趣味、市庶化、艺术化

（隋、唐、五代、宋、辽、金，581—1279 年）

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南北分治后，至隋，中国复归统一。唐代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盛世，贞观—开元之治。隋唐与萨珊波斯等国家友好往来，胡商来到唐朝各大城市坐地经商。西域于田强盛，号称“金玉大于田王国”，与隋唐保持着友好联系。波斯同时也带来了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大大影响了唐代的饮食、穿着等生活习惯及其文化艺术。传统的玉文化也受到冲击，增添了外来的风采。由于受到于田国玉带的影响，唐宫廷出现了饰有玉銙的革带，玉銙图案有：胡人奏乐、蕃人进宝等外来题材。此后，五代、宋、辽、金、明均沿袭玉带制度。玛瑙羚羊首杯、玛瑙椭圆形杯及玉八瓣花形杯等三种玉杯都是受到西亚金银器品型的影响后由唐匠师制成的新型玉器。玉单耳椭圆花形杯是在花形杯的一侧加上花形扁耳，有一穿孔，便于携带，此杯仍然保留了几分西亚的艺术韵味。

佛教玉器中出现的飞天均作上裸、披巾、面正、侧卧之形式，身下托祥云，似在空中飞舞，给人以轻盈飘逸之感。上述玉器和玉雕均为前期所无的新造型，洋溢着外来趣味，给传统的玉文化增添了新血液。这种传统玉文化的外来风趣，在盛唐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至中、晚唐逐步减弱，至五代、宋基本消逝。隋唐出现了在玉器上加金饰，使金玉辉映，典雅富丽。如隋金扣玉盏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金扣器皿。唐白玉镶金镯、青玉花鸟纹钗均为金玉结合的女用饰品。这也是传统玉文化的新气象。

隋唐肖生玉形象准确，神韵生动，富有现实气息，与当时的雕塑艺术异曲同工，其艺术方法基本一致，将玉雕视为雕塑艺术的一个分支，确实是非常恰当的。

玉文化对整个社会文化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陆羽《茶经》评越窑器时指出其彩色“类玉”、“类冰”，说明玉文化对瓷器艺术审美已有所影响。

五代、宋、辽、金玉文化再也见不到隋唐那样的外来趣味，它去除了隋唐的外来文化因素，继承和发展了隋唐玉文化的市庶化、艺术化的特色。金石学在此时兴起，推动了全社会文物收藏考证工作的发展，吕大临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长于文物考证鉴定，在内廷监管文物，曾辑纂《考古图》十卷，内收青铜器 210 件，玉器 14 件。

宋代朝廷用玉不减前朝，冠服、车舆、祭祀、礼仪以及衣食行乐均大量地使用玉器。富贵人家喜庆礼节往往使用金银犀玉。汴梁东街北潘家酒店，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南宋杭州已有买卖古董的坐商，称为“七宝社”，出售玉带、玉碗、玉花瓶、玉束带、玉劝盘、玉钗芝、玉绦环以及玻璃、水晶、宝石等珍贵古玩。民间设有琢玉作坊，称为“碾玉作”。内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下界和修内司玉作所均是碾琢内廷玉器的衙门或作坊。至此，古玉既是文玩又是商品，在市场流通。

上述集古尚古的社会风气影响到玉器生产。除了典章、礼仪及生活起居所用之时作玉以外，还出现了仿古彝的玉器，用作陈设。如南宋宫掖聚景园内锦壁，千朵牡丹，安顿花架，就中间沈香桌儿一只，安置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俨然是一件比商醴亚方尊还要高的大型仿古彝。内廷和富庶人家的日常用玉花色品种俱全，琢磨工艺精湛无比，花卉山石、禽鸟、狮、鹿、瑞禽神兽等玉件无不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出现了被乾隆帝称为“玉图画”的全景式构图的人物山水玉雕，这就是宋代业已完全成熟的山水画对玉坛的直接影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镂

空松下仕女图、青玉人物山子都是现存宋代玉图画的代表作，标志宋代玉器艺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南宋偏安，辟建行在，大兴土木，出土了不少的良渚文化玉器，被时人视为祥瑞。官窑、龙泉窑均有仿琮形器瓷器流传至今。南宋官窑薄胎厚釉都是在追求和田玉的温润莹泽的玉德所致。宋代玉文化的双向交流已经显而易见了。

辽金玉文化主要是移入唐、五代、宋等玉文化，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形成的。朝廷用玉则是来自五代、宋，仅仅略加损益而已。但是生活（包括精神的、物质的）用玉，除了攫取梁、晋及宋代玉器，还创造了本民族的玉器。总之，辽金玉器既吸收了宋玉的形式和工艺，又有着他们各自的民族特色，在工艺、艺术上与宋玉相似，几无创新，但在题材上却是建树良多，富有特色，如：辽代的玉熊、交颈天鹅，以及飞天摩羯、迦楼罗、杵、钺等佛教密宗玉器都是契丹族玉器的代表作，又如金代的玉逍遥及春水、秋山玉也都是女真族玉器的典型作品。由于史料和实物的缺乏，我们对辽金玉文化还了解不多，尚是一个新课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 六、以陈设化、玩赏化为特色的元、明、清玉文化 (元、明、清，1271—1911 年)

元、明、清三代绝大部分时间都于北京，其政治中心较前朝北移，其政权均为大一统。此期，藏传佛教在全国广泛传播，统治者的信仰及社会文化方面遂具不同程度的蒙藏色彩。玉文化处于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理所当然地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此时玉器多用于陈设或供玩赏，收藏古玉之风炽烈，促使玉文化有了巨大的新发展。

元代(1271—1368 年)是由蒙古贵族统治的王朝，地域广袤，文化成分复杂。崇信藏传佛教，并统治中、西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但在玉文化上全盘继承宋金传统，朝廷用玉与宋金

相埒。皇族从头到脚的装饰及其行止坐卧之器具无不用玉制成或以玉饰之。汉族、女真族广大地区仍沿宋金旧习，市庶均用玉。文人用玉制造文具，与其朝夕相处，犹如君子佩玉。仿古尊彝玉器继续流行，古玉的搜集、保存、鉴赏在文人当中一如既往，风行不止。画家朱德润编辑《古玉图》，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古玉图录。元玉器中只有二种是与蒙古族相联系的玉器，一是玉押，供签署公文、告示之用。一品高官或特赐者方可使用，十分珍贵。二是玉帽顶，明人云“至贵者值数千金”。具有代表性的玉器是“渎山大玉海”可贮酒三十余石，饰海龙、海马等十几种瑞兽翻腾沉浮于波涛汹涌的大海，气势雄伟，动人心魄。

朱元璋削平群雄，驱逐蒙古统治者，建立了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明王朝（1368—1644年）。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下诏“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皇家用玉仍沿传统，有增无减，与元相比，增加了玉带，帝王后妃死后殉玉已制度化，如玉带、玉佩俱备。由于明中期各地城市工商业发达，地主、工商业主甚为富庶，佩带饰品大多用玉和金银、宝石、珍珠等珍贵原料，陈设器与茶、酒器亦有用玉制造者。

明代没有直接统治西域，初以哈密统领诸蕃，至世宗时退止嘉峪关，通过朝贡和交易等办法获得新疆和田玉。贡玉堪用者不多，而使臣私下出售的玉都是“良玉”，每有“籍所不载”者，许自行贸易。总之，明玉较前朝似多。苏州是明代玉业的中心，“工巧则推苏州”，首都及全国各地制玉的工匠大多来自苏州。明代初期，玉器继承元代衣钵，作工严谨而精美，中期玉器趋向简略，出现具有文人色彩的玉器，如青玉松荫策杖斗杯。晚期玉器数量激增，艺术上显得粗犷，精工者较少，与金细工镶嵌宝石结合。万历皇帝朱翊钧及后生前用玉带钩、白玉兔金镶宝石耳坠、金托玉爵、金盖托白玉碗可代表此期玉器的工艺水平及其组合的复杂情况。

名工陆子刚所琢玉器反映了此期时作玉、仿古玉及文人用玉

的交错发展的形势。玉文化中的城市庶民、文人的成分与影响正在增强，这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玉器生产商品化的硕果，也是我国玉文化的新变化，由帝王、贵族、高官、显吏独享而转向中小城镇的工商富户及文人墨客分享的市庶化倾向远过宋元。

明代收藏古玉之风甚为炽热，由于古玉有限，供不应求，古董商人便以赝品出售。明末杭人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论古玉器》云：“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

清代（公元 1644—1911 年）建立后，因平息准部分庭抗礼、军事侵扰的斗争持续到乾隆二十年（1755 年）方告结束，相继而来的是回部和卓木发动了叛乱，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翦除。这种长达 115 年间玉路受阻，玉石来源没有保证，经常处于匮乏的状态，影响了玉文化的正常发展，推迟了它的盛期的到来。康、雍、乾三代皇帝均喜爱玉器，养心殿造办处设玉作，以玛瑙、水晶等材料代玉碾器或以古玉改制。从现存制品来看，均精工细作，规整端严，与明末风格完全不同。乾隆二十五年之后，内廷每年可收贡玉 2000 公斤，为皇家玉器生产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造办处玉作碾琢皇家用玉之外，还向苏州、扬州、江宁、杭州等地派制玉器。苏州玉肆从私运中获得玉材，碾制了大量玉器。时作玉除了佩饰、器皿、器具之外，陈设玉也有了很大发展。乾隆帝提倡仿古彝、瓮及仿宋玉图画（清代称“玉山子”）。从乾隆四十一——五十三年（1776—1788 年）相继完成云龙大玉瓮、寿山、福海以及大禹治水图山子等四件巨型玉雕，这标志清代玉文化已达高潮。乾隆朝玉器艺术集历代玉艺之大成，呈现多种面貌，如时作玉图案模仿竹刻刀工；肖生玉趋向写实，琢刻工整；玉图画山子追求画意与笔法；仿古彝具有周汉古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统一之处在于作风严谨，合乎规矩，一丝不苟，善始善终。后人追仿乾隆作工，然并不知其真谛，愈工愈碎，求细趋繁，反而以其过于繁琐而终成败笔。乾隆时代玉器当然也有不足之处，这

是玉肆急功近利所致，它不能代表乾隆工，亦非其过。

乾隆帝酷爱玉器，关心古玉鉴定考证，并亲自指导时作玉生产，毕生撰写有关玉器的诗文八百余篇，表达了他对玉文化、玉器（包括痕都斯坦玉器）的品评、鉴考等见解，他的这些见解是清代玉文化观的全面体现及其重要成果。晚清金石学家、收藏家阮元撰《古玉图考》，以《周礼》鉴考传世古玉，以实物补证经史，在古玉研究中使文献与实物结合，并为我们提供了典范。

清代收藏古玉之风不减明朝，因古玉不多，不能满足收藏家的要求，古董商便秘密地制造伪古玉投放古玩市场，以哄骗藏家。清代古玉赝品除了全盘继承明代作法之外，在烧伪古沁上有了很大进步，其欺骗性更大。而不少收藏家忽视玉德，偏爱沁色，使古玉收藏背离“首德次符”的品评标准。

综合以上概述，可知我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它持久不断地发展是符合逻辑的，它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螺旋状上升运动，走过了长达 8500 年的成长期，在远古阶段，玉器的作用是祭祀神鬼、充当礼仪用具、殓葬尸体、为少数权贵的生活服务。当中国社会进入近古时期以后，玉器除了继续参与祭祀、礼仪活动之外，主要是为皇室权贵、富庶人家及士大夫文人的现实物质和精神生活效力，这一时期不过 1500 年。此近古玉文化由历史上的远古玉文化脱胎而来，它极大地丰富与充实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古老而又年轻的玉文化之外，还有业已消亡的印第安人玉文化及尚存的新西兰毛利族玉文化，但这两支玉文化的时间长度、空间影响及其包容量均远不及中国玉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它同时又是中西文化间的最古老的分水岭。

## 中国古代玉器概述

中华民族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搏斗中，求得生存与壮大，并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崇尚玉器的传统。在这一高尚而典雅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历代治玉业经久不衰，持续高涨，碾琢了难以计数的精美玉器，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

在我国古代玉器诞生与成长的全部历程中，均涉及到历朝的宗教信仰、典章制度、社会道德，以及对清玩的鉴赏收藏等诸多观念意识、风尚习俗及其社会实践。“六瑞”“六器”的形成与推广，佩饰组合的完善与变化，及“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sup>①</sup>就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这些学说与史实均不同程度地被著录于经史典籍及稗史杂记之中。足以说明：它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观念意识及其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而，我国历代文人在古玉诠释上极其重视“首德次符”<sup>②</sup>的原则，且贯穿于著录之首尾。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古代玉器外流，引起了外国学者和藏家的关注。他们用矿物学的检测方法对清代“帝王玉”进行了检验，首次揭示了和田玉和翡翠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物理